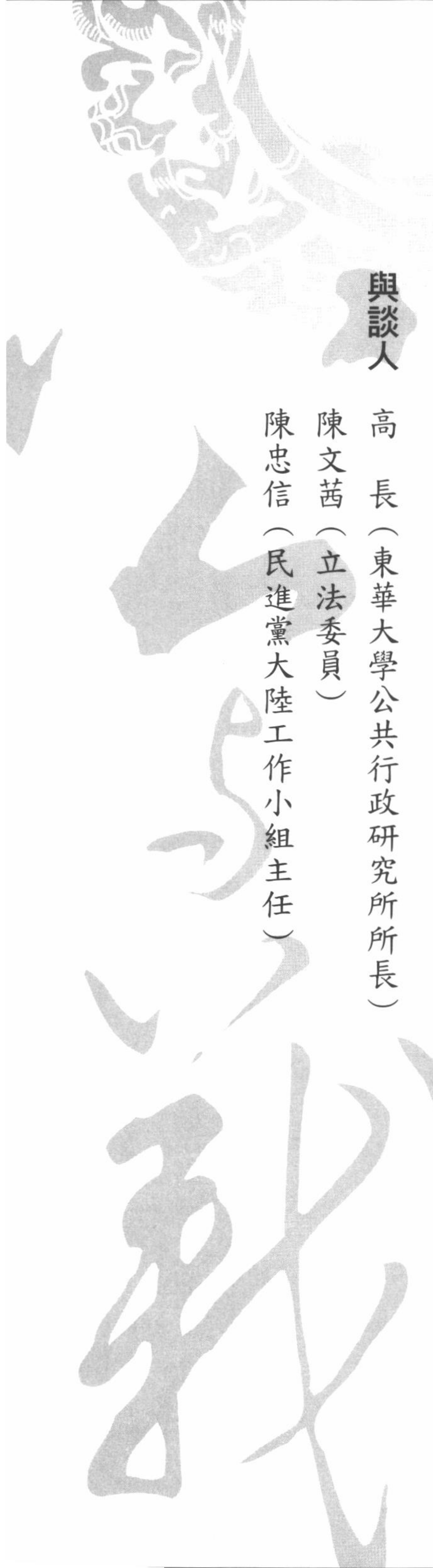


宏觀社會·議題二

大陸崛起下， 兩岸經濟、文化與 政治的衝擊

——認同問題與社會問題



- 
- 大陸崛起下，兩岸經濟、文化與政治的衝擊
 - 回歸市場機制發展兩岸經貿關係
 - 政治認同困境「綁架」兩岸關係
 - 以知識及歷史重建新局

主持人 劉兆漢（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

主談人 陳小紅（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

與談人 高長（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所長）

陳文茜（立法委員）

陳忠信（民進黨大陸工作小組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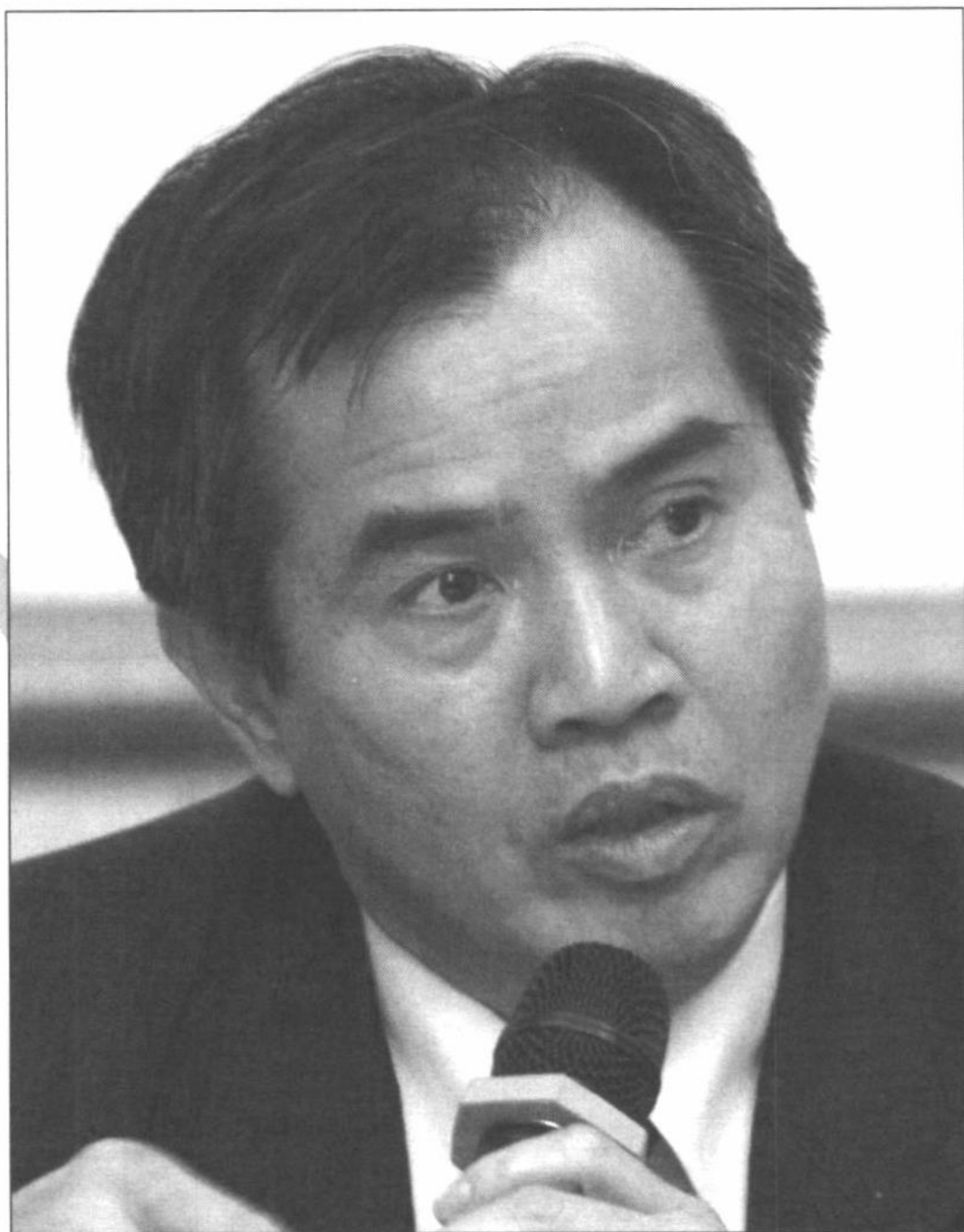
主談人

陳小紅

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博士。現任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曾任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台灣社會學會常務理事、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董事。專業領域為都市社會結構、區域經濟、社會變遷。代表著作有〈都市住宅區位分化及其成因之探討——以台北市為例〉、〈中國大陸的都市化：回顧與前瞻〉。

高長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所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研究所所長、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中華歐亞學會特約研究員。專業領域為勞動市場、總體經濟、大陸經濟問題、兩岸經貿。代表著作有《兩岸經貿關係之探索》、《中共工資制度改革之研究》。





與談人

陳文茜

紐約新社會研究學院歷史社會學博士班。現任立法委員、「文茜小妹大」節目主持人。曾任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主任、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主編、勁報董事長兼發行人。專業領域為國際事務及兩岸問題。代表著作有《文茜小妹大》、《陳文茜的虛擬人生》。

陳忠信

東海大學畢業。現任立法委員、民進黨大陸工作小組主任。曾任陸委會諮詢委員、海基會董事、美麗島雜誌主編。專業領域為社會思想與理論、國家安全。代表著作有《一葦集》、《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論述》。



《主談》

大陸崛起下，兩岸經濟、文化與政治的衝擊

——認同問題與社會問題

◎陳小紅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大國外交

近年來，儘管「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的論述各有其支持者，然而，自一九七八年北京政府確立改革開放路線以來，迄今長達二十餘年的高經濟成長，早已使得擁有十三億人口、九五九萬六九六〇平方公里土地面積的中國大陸，一躍成為全球不可忽視的

國度。尤其在歷經東亞金融危機與SARS衝擊之後，中國市場挺立不墜，也讓它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加倍確立，致部分學者更直指：「離開中國而來討論世界經濟發展的前景似乎已愈來愈無可能。」

誠然，中國大陸近期發展的諸項指標，皆有亮眼成績，如持續多年平均八%的高經濟成長率，年均五百億的外資投入，至少三分之二全球五百大跨國企業的進駐，眼前似仍無垠的廣大內銷市場，甚至世界第一條磁懸浮列車的開通，在在均展示著中國「準超級大國」的雄姿，絕對不容小覷。

至於在政治方面，中國「大國外交」的舉措更未曾間歇。遠自鄧小平的訪美，江澤民、朱鎔基於國際政治舞台上之穿梭，至去年新領導班子接事後，胡錦濤、溫家寶的陸續出訪，由俄羅斯、蒙古、英國、日本以致新加坡、法國，不啻成為除日本外，唯一涉足G8會議的亞洲國家，並挾其改革開放形象與快速經濟成長勢頭，於二〇〇二年初正式成為WTO組織之一員，更爭取到將分別於二〇〇八與二〇一〇年舉辦之北京奧運與上海世博會。期間，中國更以東道主身分，主辦過上海五國會談、APEC，以及在海南舉行的博鰲會議。在「以參與求發展」的戰略思考架構下，中國不再侷限自身僅作為「第二世界結盟」中的老大，而更積極地尋求其「全方位」的合縱連橫。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態勢下，中國

自然也不會忘記身處亞太地區之事實而亟思與東盟國家發展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十加一、十加二、十加三暨各種雙邊的TFT於焉出籠。

中國致力突破改革過程中的挑戰

深諳「外交乃內政之延長」的道理，中國外交視野的不斷拓展，必然奠基於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各層面的深化改革之上。過去二十餘年，在由計畫經濟轉軌至商品／市場經濟過程中，中國採取了諸如農村中的「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城鎮中的「工資」、「住房」、「社會保障」、「國企」、「金融」、「機構」、「戶籍」等一連串體制改革。

凡此改革又每每引發不同程度的社會衝擊與陣痛，形塑出當前大陸新一輪發展過程中的挑戰，如：伴隨國企改革而來的大量下崗／失業者之再就業問題；金融／國企／鄉鎮企業進一步發展所牽涉的「產權」問題；二元結構下，城鄉社會保障不一與區域發展不均衡而致產生之社會不公平和地區差異問題；因掌握改革開放過程中資源者之尋租行為所衍生之貪腐問題等。中國可否於二〇二五年順利地挺進擬議中的「小康社會」，就某一意義上言，即端視其有無能力有效地解決前述諸項課題。

台灣：從「經濟奇蹟」到「政治奇蹟」

回過頭來檢視台灣的發展，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領政時期，除期間發生的八二三金門砲戰外，兩岸關係基本上言可謂是各自為政的。而在那一段白色恐怖、威權統治等於今觀之均屬負面的政治氛圍下，台灣卻極其諷刺地締造出中國有史以來最富庶的經濟局面，一如今日大陸。七〇年代時，台灣持續二位數字的經濟成長曾被譽為「經濟奇蹟」，而在美蘇低盪（*detente*）對峙下，協防台灣成為美國圍堵蘇聯、中共共產勢力擴張的重要戰略佈局之一環。不過，一九七一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可謂戰後發展過程中的第一次外交挫敗，而「漢賊不兩立」政策，也讓台灣失去了更多的盟邦。蔣經國總統繼事後所提出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號召，雖起到凝聚民心的若干作用，加以十大建設、十二項建設、十四項建設的次第展開，堪稱為台灣結構轉型找到了新的出路，而「三不政策」伴隨著「務實外交」，似乎亦築起一道國家安全的擋火牆。唯由「威權」過渡至「權威」體制的作為，卻難掩當時仍處黨外者之不耐，經過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的爆發，暨其後一連串街頭社會運動之出線，終於博得了衝撞體制後而來的國會全面改選、戒嚴之解除和總統的全民直選。

「九二共識」到「兩國論」主張

首任民選總統李登輝自詡台灣當時情境為經歷一場政治上的「寧靜革命」，執政早期尚期繼經濟奇蹟後，得以再開創政治奇蹟，因而贏得「民主先生」雅號。是時大陸對台政策祭出「一國兩制」、「葉九條」，我方除回應國統綱領外，更成功地在新加坡促辦了辜汪會談，簽署所謂「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經濟學台灣、政治學台北」是當時我方相當理直氣壯的對中宣示。唯李登輝執政後期接受日本司馬遼太郎的訪問時，操弄「台灣人的悲哀」省籍情結、提出「兩國論」，和赴美康乃爾大學訪問演說等，均觸及經濟日益壯大的中國之敏感神經，一九九六年飛彈危機與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朱鎔基嚴厲的對台喊話，在「李六條」、「江八點」的糾纏與海基、海協對話機制之不順暢中，似仍看不出解套跡象。

兩岸經貿、民間交流日益熱絡

弔詭的是，蔣經國前總統於去世前不久宣佈的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為台灣的民主化揭開了序幕，而其於去世前釋出開放台灣人民赴大陸探親的政策，也開啟了兩岸正

式往來的紀元。兩岸間的接觸於今亦已由老兵、老鄉次第推展至各個面向。統計資料顯示，一九八八年迄二〇〇三年九月止，台灣赴大陸旅遊人數已高達二九一三萬一九〇〇人，每年平均約二百萬人；而一九八八年迄二〇〇三年十月止，大陸來台人數亦達九十六萬三三八九人，平均每年約六萬五千人。探親、旅遊與各項文化交流外，兩岸經貿往來之頻繁更不在話下；事實上，一九九一年迄二〇〇三年十月止，經濟部投審會統計指出，我方赴大陸投資企業共計三〇七九二件，總金額達三三二·八億美元。至於長駐大陸台商人數保守估計至少有一百萬人。近年來，台灣每年賺取大陸約二五〇億元的外匯，大陸業已取代美、日躍升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伙伴，而台灣也已成爲大陸的第一大進口國。此一貿易依存關係在大陸崛起成爲「世界工廠」態勢下，短時間內似尚難降溫。

國際生態裨變下的台海關係與台灣政策回應

總之，二〇〇〇年，陳水扁接任總統時的台灣內、外環境，與兩蔣甚或李登輝時期相比，均已起了不小的變化。首先，隨八〇年代蘇聯瓦解，三強鼎立的國際局勢已有了轉變。在綜合國力方面，現階段的中國固然仍非美國對手，然其所蘊藏的市場商機、經貿、

科技潛力，均已挑戰美國作為世界第一霸權的地位，尤其長征火箭升空後，兩國戰略武器之競爭更加白熱化。加以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戰事後，除英國外，與美交惡的德、法等歐盟國家，或看重中國商機，或厭惡美國獨大氣焰，而蘊育出一股新的國際均衡態勢。新一代中共領導人審時度勢與東協的結盟，更使中國坐實了亞太大國的地位。就連七〇年代被冠以「亞洲第一」的日本，都不得不費心與之周旋。在內政方面，在「發展是硬道理」的指導原則下，中國當然也沒閒著，沿海、沿江、沿邊的開發策略正一步步見證於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唐、東北以至大西部開發的謀略上。北京、上海固然為奧運、世博、打造世界級城市而大興土木，香港、澳門也忙於緊抓CEPA帶來的機遇，急於接軌珠三角。

反觀台灣，前一階段所推行之「戒急用忍」，癱瘓了亞太營運中心的擘劃，至於「三通不通」亦嚇阻了外商來台投資熱度，無視於中國的「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策略因之不免跛腳，「台灣平台」始終亦難建構起來。台商一再等待三通未果下，大多無奈地決定「用腳投票」，且愈來愈多選擇去而不返，致「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難有實現可能。對阿扁總統言，更嚴峻的挑戰還在於內部結構如何轉型與整合的問題。持續低迷的經濟成長率（甚至於負成長）、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逐漸竄昇的失業率、日益突顯的貧富差距、前朝遺留下來的黑金選舉文化和族群間隙，均待一一弭平。

於此消彼長的大環境下，或許基於「時間並不站在台灣這邊」的考量，遺憾的是，吾人看到的是更多以政治手段企圖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作法。儘管學者們再三呼籲留心台灣有被邊緣化的危機，政策上似乎始終透露出「本土化」多於「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思維。見諸於教育方面者，至少包括「通用拼音／漢語拼音」之爭論，以及將中國史自台灣史中區隔開來而列入世界史、加強母語教學、加重本土課程（認識台灣）比重等。見諸於社會融合方面者，如宣揚台灣人意識、以本土語言作為檢證愛台與否的標準等。而在政治面向上，除於護照上加註「台灣」字眼外，近半年來更因勝選考量而提出一邊一國、公投、制憲等主張。兩岸關係不僅因此降至冰點，美、法、日等國元首對此亦加指點，賠盡了台灣領導者與百姓的尊嚴。

國家認同——本土化？去中國化？

由後李時期以迄阿扁當政階段，前述各項政治與社會舉措若置於兩岸競局的大環境下觀察，其中邏輯自然不難掌握。露骨地說，或許也正因此消彼長，政府對全球化脈絡下經濟活動的日益整合難以確實有效地阻擋，轉而將精力投注於「國家」與「社會」的重構

(nation-building and/or institution-building)，認為在歷史的當兒，或許只有重新定位「台灣」，方有行使國際法上「國格」之可能。基此，愈擔心被邊緣化而成為附屬於巨大中國的一省，加入聯合國、國家正名、台灣問題國際化等動作即愈為彰顯，台灣主體意識亦愈為強烈。

而為區辨本土與外來的差異，去中國化的腳步自然更形緊湊。只是，與大陸同文同種、本是同根生的善良小百姓，卻被迫明確表態與選邊站；人口結構中絕大多數的閩南族群，幾乎保證了族群牌的無往不利；除成立聊備一格的原民會外，硬生生地將「正港台灣人」的原住民（二%）遺忘到另一個角落；而十二%至十五%的外省族群，哪怕即是出生於此，也都被視為帶有原罪。每遇選舉，此一撕裂更形鮮明。諷刺的是，兩岸交流迄今，來台之大陸新娘已逾十八萬人，若加上其他外籍新娘則近三十萬人，近日的一項統計更顯示，台灣每四位新生兒中就有一位的母親為外籍新娘，此等子女長大後，究竟應認同自己為「台灣人」？「中國人」？抑或「 $\times\times$ 人」？另一方面，相關調查也透露，七成的台灣年輕人有意願到上海或大陸發展，更有研究指出，年輕人在有選擇前提下，寧願當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的比例似乎還高於當台灣人或當中國人。這對如此強調國家認同的當今執政者言，又具何特殊意義呢？

台灣政治本土化的激進發展，當然也逼使中國大陸不得不提前其處理台灣問題的時間表，只要對「台獨建國」的憂慮日深，兩岸間的安全似乎即愈無保障。不同於以往的不過是其展示「大國」更熟練的外交身段罷了！當「四不一沒有」再也無法合理化對岸「聽其言，觀其行」的立場時，公投議題引起美、日、法等高層之關注甚或指點，便成了再自然不過的事兒！

邁向共存共榮、互補合作的未來

吾人或許可以後附表格為參考，約略回顧過去五十年來兩岸經濟、政治與社會變遷情勢之錯位，以鋪陳出未來應可採循之走向。（見：**【兩岸經濟政治社會變遷表】**）

其實，兩岸內部各有其待解決問題，大陸此刻正忙於各項制度變遷，台灣在以小博大過程中，更應戮力於結構轉型，提升教育／科技水平和人民的生活素質，發揮永遠的「燈塔效應」，而非鎮日製造島內的集體焦慮！兩岸領導人均宜順應全球化／區域一體化走向而非逆勢操作，應秉持更寬廣的人文與社會關懷和政治智慧，掌握各種社會脈動，尋求互補合作空間以擘劃中國人的世紀，庶幾「分」、「和」議題也就水到渠成，自然圓滿矣！

兩岸經濟政治社會變遷表					
時期 項目	兩岸	中國大陸		台灣	
		1949-1977	1978-	1949-1986	1987-
經濟	計畫經濟	拼經濟 ——改革開放下力圖接軌市場經濟，大力招商引資	拼經濟 ——以臻「均富」社會為依歸	日益自由化與國際化，唯受政治影響日深	
政治	意識型態主導 ——一連串的政治鬥爭／運動	強勢政府領導下的各項體制改革；如： 1. 工資改革 2. 住房改革 3. 社會保障體制改革 4. 國有企業改革 5. 金融財改體制改革 6. 機構改革 7. 戶籍制度改革等	由威權體制逐漸過渡到權威體制	拼政治 ——隨民主化紛至沓來的各項選舉強調本土化與去中國化	
社會	強政府弱社會	各項體制改革所引發的一連串社會矛盾，如： 1. 三農問題 2. 就業問題 3. 區域／城鄉差距問題 4. 社會保障問題 5. 貪腐問題等	敬業基本和諧	發展益趨多元化，唯受政治衝擊，族群對立突顯，急功近利氣氛瀰漫	